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Volume 1 新第一期 Article 19

10-1999

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

Pingyua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平原 (1999)。大學之道: 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嶺南學報》，新第一期，539-55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1/iss1/19

This 專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學報》新第一期(1999年10月)，539-553

大學之道
——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

陳平原

北京大學

一、引言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國之大學，其價值趨向與基本路徑，乃舶來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學。因此，儘管教育史家喜歡談論「四千年的中國大學教育」，古今中外「大學」之巨大差異，依然使得二者很難同日而語。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卻談不上很好地繼承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

積弊已久的傳統中國教育，其「無裨實用」，在晚清，成為傳播福音的傳教士和尋求富強的士大夫集中攻擊的靶子。時人之「破舊」，主要攻擊的是科舉取士；至於各式書院之利弊得失，反而無暇細究。祇是在新學制已經創立的二三十年代，有過研究書院的小小熱潮。此後，又是長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復興的跡象[1]。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國的大學，依舊是歐

[1]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下編，頁274-277，收錄二三十年代關於書院研究的論文五十篇，作者有胡適(1891-1962)、柳詒徵(1880-1956)、盛郎西、謝國楨(1901-1982)、陳東原、梁甌第、班書閣(1900-?)、吳景賢、王蘭蔭等。此期間出版的專著有周傳儒(1900-?)的《書院制度考》(上海：勵志書局，1929年)、盛郎西的《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和劉伯驥的《廣東書院制度沿革》(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書院研究著作有：陳元暉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章

美模式的一統天下。這就難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國大學教育歷程時，用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斷語：「歐洲大學的凱旋」[2]。

但這不等於說，本世紀中國的教育家，不曾有過借鑒書院教學、發揚傳統教育精神的願望與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為(1858-1927)、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6)、唐文治(1865-1954)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學問家或政治家融會中西教育的嘗試，探索精神滲透與制度建設之間的巨大張力，力圖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大學的健康成長提供也許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二、廢科舉・開學堂・育人才

廢科舉，開學堂，育人才——這幾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於具體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遠流長的書院。「時局多艱，需材尤急」，無法生產堅船利炮的書院，其教學宗旨及培養方案，非改不可。於是，出現了三種頗有差異的選擇：

1. 整頓書院，增加西學課程(胡聘之等)；
2. 保留書院，另外創設講求實學的新式書院或學堂(廖壽豐[1836-1901]等)；
3. 請皇上發布詔書，「將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社學、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康有為等)。[3]

取消書院，以便集中人力財力，發展新教育，這一「興學至速之法」，從鄭觀應(1841-1923)最早提出，迭經胡燏棻(1840-1906)、李端棻(1833-

柳泉，《中國書院史話》(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5年)、楊慎初等，《岳麓書院史略》(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朱漢民，《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年)、丁鋼，《書院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李國鈞等，《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陳谷嘉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參見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y,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6), Chapter 1.

[3] 參見胡聘之等，〈請變通書院章程折〉、廖壽豐，〈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折〉、張汝梅等，〈陝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折〉、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及〈清帝諭各省府廳州縣改書院設學校〉，均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上冊。

1907)、康有為等的一再奏請，終於成為最高統治者的諭令，通行全國。其間雖有反覆，但秋風日緊，大樹飄零已成定局。

科舉取士與書院教學，二者既有聯繫，但更有差別。明清兩代，科舉制度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猛烈抨擊；到了十九世紀末，更成了中國落後挨打的「罪魁禍首」。可以說，取消科舉取士制度，起碼在學界，已有長期的理論思考與輿論準備。至於廢除書院的決策，則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並沒有認真討論過。當初之所以如此決斷，主要是為了應急——將原有款項移作興辦學堂之用，以便盡快培養出可以「富國強兵」的「有用之才」。這就出現了一個令後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歷來習慣邁四方步的中國人，突然間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書院制度，而且不吭一聲。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1893-1960)所抱怨的，「光緒二十四年以後的改革教育論者，並無一人對於書院制度等有詳密的攻擊或批評」[4]。這裏的「並無一人」，乃激憤之言。實際上，也有個別的抗爭，祇不過人單力薄，無濟於事。比如，章太炎便對如此「急功近利」的「興學」，等於慫恿朝廷統攬教育大權、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當激烈的批評[5]。

單就口號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幾乎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的。康有為堅持將「上法三代」放在「旁採泰西」之前，張百熙(1847-1909)也是先「上溯古制」，後才「參考列邦」[6]。可這些溝通中西的努力，最後都基本上落空。翻閱晚清及民國的各種學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達維護傳統倫理道德的強烈願望外，制度建設方面幾乎祇能「旁採泰西」。原因是，上古學制的準確面目，今人難以把握，更談不上將其導入晚清的學制創新。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來補充歐美大學體制；清華校長梅貽琦(1889-1962)則重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7]——可這都是二十年代以後的事，其時書院已經逐漸隱入歷史深處。

---

[4]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頁14。

[5] 參見陳平原，〈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學人》，2期(1992年7月)，頁1-39。

[6] 參見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和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均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頁80-82、195-196。

[7] 參見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4，頁65；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13卷1期(1941年4月)，頁1-3。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寧願縱論飄渺含糊的「三代之學」，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書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願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擔心舊體制因而「藕斷絲連」等。可這麼一來，傳統中國的教育精神，被高懸雲端，無法介入本世紀初極富激情與想象力的制度創新。祇是在新學制已經完全確立，書院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教育家們方才回過頭來，對書院的黯然退場表示極大的遺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稱的胡適便如此大發感慨：

> 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8]

大略與此同時，胡適的好友、同樣留美歸來的任鴻雋(1886-1961)、陳衡哲(1890-1976)夫婦聯名發表〈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提議〉，特別標舉中國的書院精神，希望將其與歐美大學制度相結合：

> 我們以為當參合中國書院的精神和西方導師的制度，成一種新的學校組織。中國書院的組織，是以人為中心的，往往一個大師以講學行誼相號召，就有四方學者翕然從風，不但學問上有相當的研究，就是風氣上也有無形的轉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書院的組織太簡單了，現在的時代，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博通眾學，滿足幾百千人的希望，而現在求學的方法，也沒有一人而貫注幾百人的可能。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可以兼採西方的導師制。就是一個書院以少數教者及少數學者為主體；這個書院的先生，都有舊時山長的資格，學問品行都為學生所敬服，而這些先生也對於學校(生)的求學、品行兩方面，直接負其指導陶熔的責任。[9]

取大學管理之組織與書院教學之精神，二者合而為一，這一主張，同上述梅貽琦〈大學一解〉中的說法，倒是不謀而合。

胡、梅、任、陳諸君，均為留美學生，尚且對即將遠去的書院「依依不

[8] 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21卷3期(1924年2月)，頁106。

[9] 任鴻雋、陳衡哲，〈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提議〉，《現代評論》，2卷39期(1925年9月)，頁12。

捨」，那些在國內完成學業者，當更有感觸。出身杭州詁經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擊朝廷一律廢書院改學堂的決策，以及江陰南菁書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獨力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都與其學術背景大有關聯。至於謝國楨、金景芳(1902-)、錢仲聯(1908-)等之大力表彰書院教學傳統，也與其早年追隨梁啟超(1873-1929)或就讀復性書院、無錫國專密不可分[10]。可所有這些，均祇是個人行為，其規模與效果，無法與當初摧枯拉朽的學制創新相比擬。

「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擅長「以史為鑒」的中國學人，在追懷日益遠逝的書院的同時，開始「補偏救弊」。於是，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無法完全漠視的「風景線」。那便是：借書院改造大學，或重建已經失落的書院。

三、中西高等教育制度分合的各種嘗試

晚清的教育改革，康梁師徒無疑是最為積極的參與者。不祇因其大力提倡，促成了書院改學堂詔令的頒發，更因其辦學實踐——廣州的萬木草堂和湖南的時務學堂，彰顯了從傳統書院向現代學堂的過渡。

康有為之講學萬木草堂(1891-1898)，以孔學、佛學、宋明理學為本，以史學、西學為用，課程設置及教學方式頗多創新之處。弟子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第三章〈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的概括不無道理：

> 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11]

萬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很可能並非自覺的追求。康氏的理想，乃全力以赴追摹西方，祇是囿於主事者的知識結構，方才弄得這般「半中不西」。之

[10] 參見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281-322；金景芳，〈從抗日戰爭時期的復性書院談起〉，《岳麓書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輯1，頁386-389；錢仲聯，〈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文教資料》，1985年2期，頁90-92。

[11]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清議報》，100期(1901年12月)，頁1-23。

所以如此立說，因《大同書》中對「大學院」的設計，傳統書院的影子蕩然無存。康氏心目中「大同之時」的大學，最關鍵的幾條，如「無一業不設專門，無一人不有專學」、「雖有事於虛文，而必從事於實驗」、「農學設於田野，商學設於市肆，工學設於作廠，礦學設於山顛，漁學設於水濱，政學設於官府」、「二十歲學成，給卒業證書而出學，聽其就業」等[12]，都與傳統書院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馳。

祇能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康氏萬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其新舊體制及精神的諸多纏繞糾葛，值得教育史家認真探究。弟子梁啟超的籌辦湖南時務學堂(1897-1898)，基本上是依樣畫葫蘆。〈時務學堂學約〉之強調立志、養氣、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行教[13]，不完全是康師家法，夾雜了一些「湖湘學派」的氣味，大概是為了「在變通損益中獲得其生存權」[14]。但〈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對讀書法及具體科目的設計[15]，則明顯來自萬木草堂。至於教學效果，則不妨借用楊樹達(1885-1956)的〈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

> 惟我楚士，聞風激揚。乃興黌舍，言儲棟樑。禮延我師，自滬而湘。濟濟多士，如饑獲糧。其誦維何？孟軻公羊。其教維何？革政救亡。士聞大義，心痛國創。拔劍擊柱，踊躍如狂。夫子詔我，攝汝光芒。救國在學，乃惟康莊。[16]

時務學堂的外課生李肖聃(1881-1953)撰有《星廬筆記》，稱：「萬木草堂教法，頗張陸、王而抑程、朱。梁終身守師說不變」[17]。我想補充的是，這裏所說的「守師說」，不祇是論學宗旨，更應該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二十多年後，已經退出政界一心講學的梁啟超，希望在新式學堂中實行

[12]康有為，《大同書》(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己部第6章，頁217-220。

[13]〈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冊2，頁23-28。

[14]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8章，頁504-543。

[15]〈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中西學門徑書七種》(上海：大同譯書局，1898年)，頁6-14。

[16]楊樹達，〈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94。

[17]李肖聃，《星廬筆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39。

自由講座制。理由是，近世學校教育有兩大缺點：第一，「此種『水平線式』的教育，實國家主義之產物」；第二，「其學業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於自由講座制的具體實施，則有如下規劃：

> 此種組織，參採前代講學之遺意而變通之。使學校教師學生三者之間，皆為人的關係，而非物的關係。……如此則教育不至為「機械化」，不至為「凡庸化」。社會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養成也。[18]

大概是為了實踐自己的諾言，梁啟超慨然出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導師，希望「在這新的機關之中，參合着舊的精神」。具體說來，便是「一面求智識的推求，一面求道術的修養，兩者打成一片」。可兩年多後，梁氏不得不承認理想落空：上課下課，「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師生之間，「除了堂上聽講外，絕少接談的機會」[19]。

緊跟時代步伐的梁啟超，其談論「自由講座制」，並非一時衝動，很可能是基於早年就讀萬木草堂以及執教時務學堂的經驗。如果說康梁師徒是從明清書院傳統裏衝殺出來，其談論教育，自然而然地帶有書院的印記；蔡元培、胡適則是在建立現代大學的過程中，意識到某種溝通整合東西方教育精神的機遇，方才回過頭來，重新評價已經失落了的書院。

蔡元培之留學德國與胡適的就讀美國，都給其教育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歸國辦教育，蔡、胡均以歐美大學為樣板。對於傳統中國的教育體制及精神，蔡、胡二位跟絕大部分新文化人一樣，其實並不十分看好[20]。祇是由於某種特殊因緣，比如「道爾頓制」的引進，或創辦研究院的需要，書院的身影及魅力，方才被認真關注。

為了落實「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的辦學宗旨，蔡元培出長北大後，極力推進研究院的創設。1918年擬設的各門研究所，終因經費缺乏而擱淺。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

---

[18] 梁啟超，〈自由講座之教育〉，《改造》，3卷7號(1921年3月)，頁23。

[19] 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138-1139。

[20] 1925年4月，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德國作了題為「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的演講，稱對於古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其質與量不能估價過高」，晚清以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見《蔡元培全集》，卷5，頁7)。實際上，自從書院制及科舉制被正式廢除，中國人對於自家傳統教育方式，信心始終不足，不存在「估價過高」的問題。

大綱提案〉，獲得了通過；第二年一月，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21]。這一表述，與三、四年後胡適為清華學校設計研究院的思路，似乎不太一致。可要是考慮到蔡校長1922年鄭重其事地向學界推薦〈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就不難明白其中的聯繫。〈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稱：

> 本大學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周流於社會。[22]

蔡先生之所以對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於「近二十年來，取法歐美，建設學校；偏重分班授課、限年畢業之制。書院舊制，蕩然無存」，故寄希望於「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23]。

1925年3月6日，清華校務會議通過〈研究院章程〉，稱「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故決定「延名師，拓精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曰：「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於國學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確有收穫」[24]。此研究院的基本設計，很可能出自北大教授胡適。

據1928年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藍文徵(1901-1976)稱，清華校長曹雲祥(1881-?)請胡適幫助設計研究院的組織結構與發展方向，於是：

> 胡氏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為研究院繪一藍圖，其特點為置導師數人(不稱教授)，常川住院，主講國學重要科目，指定研究生專題研究，並共同治校；置特別講師，講授專門學科。後來研究院的規章，大致即本此藍圖。[25]

---

[21]〈公布北大〈研究所簡章〉布告〉，《蔡元培全集》，卷3，頁439。

[22]〈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新教育》，5卷1期(1922年8月)。

[23]〈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蔡元培全集》，卷4，頁247。

[24]〈研究院章程〉，《清華週刊》，360期(1925年)。

[25]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清華校友通訊》，新32期(1970年4月)；此注所引部分又見俞大維(1897-1993)等，《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頁140。

我以為，此說大致可信。適之先生自1917年進入北大任教，隨即積極參與研究所的籌備與創設，與蔡校長多有交流。更重要的是，1923年底，胡適應邀在南京東南大學做題為〈書院制史略〉的演講，其中借書院改造現代大學的思路，與傳說中第二年為清華研究院所做的規劃不無共通之處：

> 我為何講這個題目？因為古時的書院與現今教育界所倡的「道爾頓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佔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

在胡適看來，所謂的「書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時代精神；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最後一點尤為重要，因其「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26]。

據藍文徵稱，胡適不祇為清華研究院繪制藍圖，還推薦聘任梁啟超、王國維(1877-1927)、章太炎。梁、王二君日後果然執教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並在短短幾年內培育了文史研究界的一代英才；章太炎卻不然，始終卻聘。與民國初年的拒絕進入北京大學一樣，章氏之桀驁不馴，所表達的，不是對具體人事、而是對整個制度的抗爭。

胡適因傳統書院與道爾頓制「精神相同」而加以推崇，這一發現並表彰書院的思路，絕非章太炎所能贊同。從1906年發表〈與王鶴鳴書〉，章太炎對政府之推行新學堂，始終抱懷疑態度。章氏立論鮮明且一以貫之，即強調教育必須考慮本國文化特性，不能全盤照搬歐美；朝廷之廢書院改學堂，侵佔了私學的生存空間，很容易導致民間學術的萎縮，進而剝奪在野之士「著書騰說，互標新義」的權利；學校教育之「專重耳學，遺棄眼學」，過求速悟，不講虛心切己體察窮究，於學生日後之治學危害極大；學生才性不一，教師祇管大班講授，而非因材施教，實在是糟蹋人才[27]。正是有感於此，章

[26] 胡適，〈書院制史略〉，頁106。

[27]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章。

氏始終拒絕進入現代大學體制，而是模仿古代大儒之設帳講學。

太炎先生前兩次的講學(東京和北京)均與政治生涯糾結在一起，近乎「業餘愛好」。進入三十年代，章氏完全退出政壇，主要精力集中在講學與著述。所創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1936)，更是直接將其教育理想付諸實踐。

與此相類似，馬一浮(1882-1967)也拒絕了北大等名校的盛情聘請，選擇獨立講學的姿態。可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革命與知識生產的重心，在大學而不是古老的書院。大儒的個人魅力，化解不了制度之強大壓力。馬一浮之創辦復性書院(1939-1947)，所面對的種種困難，與章氏國學講習會大致相同。

問題非常明晰，不必曲裏拐彎：第一辦學經費，第二學生出路。辦書院需要資金，章太炎的創立國學講習會、馬一浮的籌辦復性書院，都是蔣介石以私人名義給的錢。沒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書院長期運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拿了政府的錢(無論是以什麼形式)，所謂「完全獨立」，則祇能是說說而已。因為，政府一旦感覺到書院之標榜「獨立自主」危及其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祇要取消「饋贈」，很快就能「天下太平」。至於學生出路，更是個大問題。不接受教育部的領導，不與現行學制「接軌」，學生便沒有證明其知識與能力的「文憑」。馬先生說的沒錯，「幾曾見程朱陸王之門有發給文憑之事？」[28] 可在講求學歷的現代社會，沒有文憑，即便有名師的推薦，也不見得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工具理性佔主導地位的今日，一切講究「符合程序」，那些學有專長且特立獨行之士，還能獲得大家的普遍尊重嗎？還能憑借自身能力得到固定的飯碗嗎？倘若章、馬希望他們的書院能夠長期辦下去，便不能不考慮這些形而下的問題——好在這兩個書院存在時間不長，而且招生人數也不多。

章太炎、馬一浮都是明白人，並非對西洋學術一無所知，而是希望砥柱中流，為往聖繼絕學。如此拒絕進入現行體制，注定其辦學不可能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祇是放長遠點，這種抵抗流俗的姿態，未必沒有意義——這還不包括其各自代表的學術思潮。

對傳統書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順從潮流，不像章、馬那麼固執己見，非要與現代大學制度對立的，可以舉出唐文治和錢穆(1895-1990)。前者1920年創建無錫國學專修館，勵精圖治十年，於1928年通過考核調查，被

[28] 參見馬鏡泉等，《馬一浮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95、83。

批準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改名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50年因經費支絀被合併，取消建制。三十年間，無錫國專校友約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傑出人才，如早期學生王蘧常(1900-1989)、唐蘭(1901-1979)、吳其昌(1904-1944)、蔣天樞(1903-1988)、錢仲聯，後期學生馬茂元(1918-1989)、周振甫(1911-)、馮其庸(1924-)等。

無錫國專的教學很有特色，除了規定課程並按時上課，不取傳統書院的講學制，還有點現代學堂的樣子外，其課程設置及講課方式，均與一般大學中文系不同。比如，選讀原著，不做通論；重在自學，課程不多；練習誦讀，重視文言文的寫作；師生關係極為密切等[29]。既被納入新教育體制，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無錫國專的這一獨特命運，與國民政府尊孔讀經的文化政策有關。1931年11月國際聯合會教育科派唐克爾・培根來華考察教育，參觀過無錫國專後大發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裏才看到純粹中國文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30]。這段常被唐校長引述的妙語，自然可以有多種讀法。但無論如何，與無錫國專「研究本國歷代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期於世界文化有所貢獻」的辦學宗旨，還是大致脗合的。在這個意義上，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與現代教育體制的「磨合」，基本上是成功的。

錢穆之創辦新亞書院，與唐文治之經營無錫國專，有異曲同工之妙。保存於《新亞遺鐸》的早期新亞書院的〈招生簡章〉，至今讀來，仍值得再三回味：

> 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作為教育家的錢穆，特別強調通識，且要求學問人生合一。這一點，可以1953年頒布的〈新亞學規〉作為例證：

> 一、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29] 參見錢仲聯，〈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黃漢文，〈緬懷唐文治先生〉、吳雨窗，〈唐調〉等，均見《文教資料》，1985年2期。

[30] 參見《文教資料》，1982年7-8期，「唐文治與無錫國專資料」項下所收各文。

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

九、於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專業之進修；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31]

新亞書院的教學特徵及奮鬥歷史，在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精采的描述，不待筆者贅言。我祇想提醒讀者關注一點，即當香港政府有意選擇新亞、崇基、聯合三校組建香港中文大學時錢穆的態度。新亞同人多持異見，而錢穆則力排眾議，同意合併，最主要的理由是：「新亞畢業生，非得港政府承認新亞之大學地位，離校謀事，極難得較佳位置」[32]。

又要接受政府的領導與監督，又希望保存傳統書院獨立辦學的特色，其間回旋的餘地，其實不是很大。於艱難中崛起的新亞，為學生及教師的世俗利益着眼，祇能接受香港政府收編，進入現行體制，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要生存與發展，還是要個性與特色，倘若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當事人的痛苦與困惑不難體會。

所謂借鑒書院之獨立辦學，不祇是具體的教學方法，更包括文化理想與政治姿態。從二十年代初起，挑戰現行大學體制者，大都不將目光局限在教育學的范疇。青年毛澤東之強調傳統書院師生感情甚篤、精神自由往來，以及課程少而研討周，故「比學校實在優勝得多」，似乎祇是關注「研究的形式」[33]。可眾所周知，湖南自修大學的「自由研究」，主要體現為政治上的結社。這麼一所「前所未有的新型學校」，在教育史家眼中，「基本任務是提高黨團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故應該與日後的工農紅軍大學、中共中央黨校相提並論[34]。

體制外的獨立講學，容易形成學派，也可能發展成為政治上的反對黨，理解這一點，並不需要特別深邃的目光。五十年代以後大陸之取消私學，對於思想一統，起了很大作用。就在新政權建立不久，熊十力(1886-1968)曾上書希望恢復三個私立講學機關：歐陽竟無(1871-1943)創設的支那內書

[31]〈招生簡章〉及〈新亞學規〉均見錢穆，《新亞遺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頁1-6。

[32]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頁274。

[33]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新時代》(長沙)，1卷1期(1923年4月)，頁1-4。

[34]參見熊明安編，《中國高等教育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頁430-433。

院、馬一浮主持的智林圖書館，以及梁漱溟(1893-1988)執掌的勉仁書院，目的是「存舊學一線之延」[35]。如此低調的申辦，也都沒能獲得諒解。唯一能喚起對於〈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的遙遠記憶的，是執政黨主席毛澤東多次批評學校的教學法：

> 反對注入式的教學方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我們為什麼不反對？[36]

「要自學，靠自己學」、將材料發給學生，「叫學生看，研究」、「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37]，諸如此類的教導，在1967年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行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中，可以找到不少。可此類祇講方法不問主義的「最高指示」，即便有其合理性，比起「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樣「高屋建瓴」的論述，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無法成為今日「教育革命」的指針。

同樣在二十年代初起步，質疑其時已成主流的大學教育，梁漱溟的探索更值得關注。1924年夏，梁氏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曹州中學辦學去了；第二年春天，帶着失望與憂鬱，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學日刊》函〉中，有這麼一段話，表明其與現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 旅曹半年，略知辦學甘苦，歸結所得，彌以非決然舍去學校形式無從揭出自家宗旨。學校制度以傳習知識為本，無論招學生聘教員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應徵也所以應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則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攜為師友結合之本。[38]

此後，梁氏先後創辦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和勉仁書院，始終在現行教育體制之外積極探索。晚年之出任中國文化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更是為其畢生事業畫上一圓滿的句號。

---

[35] 參見熊十力《論六經》(上海：大眾書局，1951年)之結語，頁111-126。

[36]《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頁21。

[37]《毛主席論教育革命》，頁22、18。

[38]〈致《北京大學日刊》函〉，《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4，頁800。

創辦於1985年1月的中國文化書院，邀請八十八歲高齡的梁漱溟「出山」。此舉很大程度是一種象徵，即繼承三、四十年代書院講習的傳統。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中國文化書院曾發揮巨大作用；進入九十年代，其「培養研究文化的博士後」的願望無法實現，「為民間爭取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也受到諸多阻難[39]，實在令人扼腕。

四、結語

歐美大學制度在二十世紀中國暢通無阻，並非毫無道理。百年中國，主潮是學習西方，奮起直追。教育作為立人立國的根基，當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教育「西化」之得失，乃中國現代化事業成敗之關鍵。

談論傳統書院在二十世紀中國之被壓抑，起碼可以舉出如下理由：

第一，西學的魅力，確實無法抗拒。尤其是聲光電化、民主法制，乃本世紀中國人所夢寐以求。所有這些建立與傳播，均有賴異於傳統書院的新的教育體制。

第二，在本世紀的中國教育界，講求「實學」，乃大勢所趨。連對工程礦務一竅不通的梁任公，也都加入了勸學西藝的大合唱[40]，不難理解百年中國之重「科學」而輕「人文」。傳統書院的教育宗旨及教學方式，並不以「實學」為重，難怪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推崇。

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學堂確實優於傳統書院。課堂教學整齊劃一，便於人才的批量生產。因材施教固然困難重重，師生的情感交流更非易事。如此高成本低回報，毫無效率可言，既不符合資本主義精神，也有違「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原則。

談論本世紀書院精神之不絕如縷，並非完全否定現代大學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現代大學仍是主流。問題在於，傳統的書院教育，是否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思想資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種思路：

---

[39] 參見湯一介，〈中國文化書院十年〉，及王守常，〈中國文化書院與八十年代文化熱〉，分別收入《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6-9，頁41-46。

[40] 在《新大陸游記》第41節中，梁啟超論及游學之事，稱「宜學實業，若工程礦務農商機器之類。勿專騖哲學文學政治」(《飲冰室合集・專集》，冊5，頁130)。

從教育體制考慮：私立大學、研究院及民間學會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多元化的貢獻；

從教育理念考慮：全人格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實用主義傳統；

從教學方法考慮：強調獨立思考、自學為主、注重師生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至於某些具體學科及研究領域——如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借鑒書院教學，效果十分明顯，自不待言；我想強調的是整個學術思路的轉移，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不應該祇是「歐洲大學的凱旋」。

1998年12月13日於京北西三旗

補白

「科學」一詞何時初出的典據

「科學」一詞實乃日人「東文」、「東語」(=日語)中的新譯漢字詞。惟今人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專著，*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185, 據Hepburn J.C., *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Tokyo : Z.P. Maruya, 1886 revised edition) 定科學一詞約於1886年前後出現。

其說有誤，理由如下：

(一) 江戶幕府天保三年(1832)十一月，蘭學家高野長英(1804-1850)於其西洋